

《寻乌调查》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王现东¹, 袁小云²

(1. 宁波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75;

2. 福建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寻乌调查过程深刻体现了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方法上,突出体现为实事求是、阶级分析以及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在工作方法上,主要包含开调查会、群众路线和典型调查。《寻乌调查》具有深刻的当代启示:坚定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方法,学会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注重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坚持辩证思维,处理好调查研究中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请教。

关键词:毛泽东;《寻乌调查》;调查研究;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中图分类号: A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5)05-0417-08

Ideological and working method implications of Mao Zedong's *Xunwu Survey* and their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WANG Xiandong¹, YUAN Xiaoyun²

(1. School of Marxism, Ningbo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ingbo 315175,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Xunwu Survey* stands as a paradigm of Mao Zedong's investigative research and represents a milestone docu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 holding profound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The process of "Xunwu Investigation" profoundly embodies Mao Zedong's ideological and working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d has rich Marxist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methods, it is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class analysis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s; in terms of working methods, it mainly includes survey meetings, mass line and typical surveys. The *Xunwu Survey* offers profound contemporary insights: resolutely implementing the ideological line and method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learning to identify and resolve problems through investigative research; prioritizing effective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in investigation to enhance work efficiency; upholding dialectical thinking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s in research; and adhering to the mass line by engaging deeply with the people, humbly learning from them and seeking their counsel.

Keywords: Mao Zedong; *Xunwu Survey*; investigative research; ideological methods; working methods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经验和重要法宝,是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做好实际工作的基本功和必修课。调

查研究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

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14]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是极具历史、理论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光辉文献,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典范之作。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重温《寻乌调查》,领略其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意蕴,将给我们以深刻、有益的启示。

一、《寻乌调查》的产生、地位和价值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关注社会现实,并深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兼收并蓄、敢为人先等文化基因的熏陶浸染,所以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做过湘潭、长沙、衡山、醴陵等湖南多地的调查研究,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回击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井冈山革命时期,则做过宁冈、永新等地的调查,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经验。从井冈山时期起,毛泽东就要求军队每到一地都务必开展调查研究,并将其发展成为人民军队的制度和优良传统。所以,“寻乌调查”的发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一)《寻乌调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1930年5月,红军攻克江西寻乌县城后曾在该地驻留,“寻乌调查”即发生于此,《寻乌调查》文本大概整理完成于1930年底至1931年2月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和发展的摸索,正处于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关键历史阶段,因此土地革命的政策策略问题成为革命的焦点。如何制定、调整土地政策并正确贯彻执行,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能否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发展,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要做好土地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就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农村实际情况。毛泽东反思了以往的调查研究,认为过去更注重农村而较忽略城市。随着红军的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城市成为革命工作的重要对象和实际领域,而县城是农村地主阶级统治的中心,所以深入了解其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等状况势在必

行。毛泽东说:“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的策略,是非常不可的。……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2]131}可见他当时了解城市目的之明确、意愿之强烈。

利用红军驻留寻乌县城的这段宝贵时光,毛泽东展开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整个过程他都全身心投入,自己组织并“做主席和记录”,“下大力”去做,可见他在此次调查研究极为看重,目标也非常明确。“寻乌调查”历时二十余天,不仅时间长,而且调查研究工作非常深入细致。后来根据调查材料,毛泽东整理撰写出《寻乌调查》这一长达八万余字的厚重而宝贵的历史文献。“寻乌调查”不仅规模大、历时久,而且意义非同寻常。毛泽东借此次调查深入了解了寻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状况,了解了寻乌县土地革命斗争以及红军执行土地政策的情况,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一座县城。“寻乌调查”使毛泽东再次感受到调查研究的极其重要性,由此也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和理论,特别是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 and 理论。寻乌调查过程中,毛泽东还有感而发专门写作了《调查工作》一文(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此文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被印成小册子广泛传播,并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成为经典文献。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3]109}的光辉论断,旗帜鲜明地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批判不经调查研究、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做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寻乌调查”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二)《寻乌调查》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曾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寻乌调查”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次,也是他非常看重的一次。《寻乌调查》开篇写道:“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2]118}言语之间包含着对杨开慧的怀念之情,也包含对调查研究文本损失掉的惋惜。

可见,在江西寻乌县城做的这次调查研究对毛泽东而言意义非同寻常,而“寻乌调查”的调查

研究文本也可谓非同寻常。根据此次非同寻常的调查研究整理撰写的《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典范之作,也是独具毛泽东语言和思想风格的历史文献,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有极其重要的历史、理论和学术研究价值。有研究认为,“寻乌调查”“开创了党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制定政策的优良传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方法,为形成党的土地革命正确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4]104},“也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工商业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4]57},等等。这些研究对《寻乌调查》的作用和意义作了诸多阐发。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寻乌调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历史意义,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次集中体现和展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土地政策、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的研究而言,《寻乌调查》也是宝贵的历史文献和难得的一手资料。国内外对《寻乌调查》的研究和探讨蔚为大观,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中共党史、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方志等研究领域,甚至有学者从《寻乌调查》的文体、客家方言等方面进行研究,足见其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二、《寻乌调查》的思想方法意蕴

《寻乌调查》深刻体现了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具有丰富的方法论意蕴。在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上,《寻乌调查》突出地表现为实事求是、阶级分析以及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等方面。

(一)“寻乌调查”全过程闪耀着“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光辉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核心。“实事求是”概念的广泛运用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改造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典范。经过毛泽东改造的“实事求是”,“内含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而且“更加生动通俗”。^{[5]54}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他对“实事求是”概念的利用和改造也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情。尽管毛泽东做“寻乌调查”时“实

求是”的思想既没有完整地提出也没有最终完成,但“寻乌调查”无疑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有研究认为,“寻乌调查”的整个过程贯穿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雏形,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准备。^[6]所以,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实事求是”早已贯穿在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中了。也有研究指出:“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为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认识客观世界提供了经典教材,从根本上体现并贯彻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7]总之,“寻乌调查”的全过程都闪耀着“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光辉,体现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特色,也体现了他将调查研究与正确的思想路线密切结合的思想,尤其是将调查研究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武器的思想倾向。在“寻乌调查”过程中,他专门写的《调查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即反对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张。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制定切实可行政策的过程,就是以实际行动反击“本本主义”的过程。

“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思想原则、基本立场和态度,一直贯穿在“寻乌调查”的始终。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首要的当然是详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掌握真实全面的情况,这是达成“实事求是”的基本条件,而要达到这一基本条件,就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舍此别无他途。所以,调查研究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坚实基础。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2]131}可见“充足地供给材料”以及“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对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为此,毛泽东寻求到当时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帮助,并受到“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的指点,还有很多寻乌当地人参加了调查会,调查会涉及不同阶级阶层和各方代表。详尽地占有一手材料并掌握真实、全面的情况还远远不够,还要“研究”,将“调查”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现问题,找到规律,提出解决办法。为此“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原文有着重号),“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2]132}这是掌握材料和深入分析并将其“研究透彻”加以

运用的过程,是找出“是”即“规律性”的过程,也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深入透彻地了解问题,达到“实事求是”之目的。

(二) 阶级分析的思想原则和思想方法贯穿“寻乌调查”始终

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而且非常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思想原则和方法研究中国的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写于1927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思想的开创性著作。这篇光辉文献以调查研究 and 深入观察了解中国社会为基础,充分体现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毛泽东能够“紧紧抓住中国社会各个大的集团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程度来划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分析社会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作用和政治态度”^{[5]198},这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思想方法的精髓。

在“寻乌调查”过程中,毛泽东驾轻就熟地运用了阶级斗争思想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紧紧抓住了寻乌县城经济结构和阶级问题的本质。如对寻乌县城人口成分进行深入“剖解”时,他既按行业和职业进行统计,也按土地占有关系进行分析,既分析政治地位,也分析经济剥削关系。通过翔实的调查,毛泽东指出,寻乌“农民和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寻乌城“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2]169-170}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是寻乌城人口的主体。毛泽东指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争取更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2]199}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毛泽东对寻乌县的地主阶级也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将寻乌地主分为“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两类。“公共地主”又分为“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三种,“个人地主”则有“大、中、小”三种区分,每一类型都不厌其烦地条分缕析,以便仔细摸清土地占有和剥削关系。通过调查研究,他还了解到地主阶级不同阶层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以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土地政策等方面加以区别对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地主阶级都当作革命对象。从《寻乌调查》中可以充分感受到毛泽东对阶级斗争问题的重视,也可以看出他关于阶级划分标准、阶级内部的阶层划分以及根据阶级阶层的经济政

治状况制定不同政策、采取不同态度的思想。

(三) “寻乌调查”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

《寻乌调查》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特别是注重处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辩证法思想。善于唯物、辩证、历史地认识和分析问题,作出决策,是毛泽东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的重要特点。而在辩证法运用中,毛泽东更加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发展规律。《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性著作。在《矛盾论》中,他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认为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2]320}。毛泽东之所以重视辩证法,是由旧中国纷繁复杂的矛盾所决定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是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果,也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

1930年4月红四军占领江西信丰县城时,受“左”倾思想影响,曾把在农村没收豪绅地主财产的政策照搬到城市,一度造成店铺关门、商业停顿,引发城市恐慌,引起群众不满。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城市缺乏了解,错误地把农村的政策搬到城镇,忽视城市的特殊性,忽视政策对象的特殊性,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和执行政策。毛泽东到寻乌后之所以重视调查研究,“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跟这不无关系。在哲学层面,这本质上就是没有处理好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县城不是农村,县城有其特殊性,特殊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如政治形势、经济形态、阶级结构、文化教育状况等,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对这些都详加分析,以了解其异于农村的特点。例如,对“寻乌的商业”,几乎分毫析厘,因为商业状况是县城异于农村的经济基础所在,影响到县城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对“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更是剖玄析微,将寻乌的人口成分、阶级关系、土地关系等都做了抽丝剥茧般的梳理,以把握县城特殊的阶级结构和土地关系。从内容看,寻乌的商业和土地关系的调查这两部分占了《寻乌调查》文本80%多的篇幅,目的即在于了解寻乌县城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把握其矛盾特殊性,为继续完善、制定和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寻求根据。

三、《寻乌调查》的工作方法意蕴

《寻乌调查》的调查研究工作方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过程中运用的调查研究工作方法,主要涉及开调查会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和典型调查的方法。

(一)“寻乌调查”着重运用了开调查会的工作方法

开调查会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常使用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在调查方法上的创造,成为后来中共在调查研究方面的优良传统和作风”^[8]。

何谓开调查会?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开会的形式进行调查研究。开调查会前,调查人要准备好调查大纲(包括细目),开会调查时围绕主题提出一系列问题,问题涉及不同层面,提问层层深入,有疑问的地方可以讨论、辩论、补充。调查者要虚心请教并做好记录,然后整理调查记录,分析问题,从中汲取智慧,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或为决策做好准备。受革命战争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限,开展全面性、普遍性的调查研究有很多困难,学院派的繁琐调查则更不现实。而开调查会的方式由于“调查对象集中,调查时间短,调查内容系统周密,了解问题深,反映情况快,节省人力物力等”^[8],比较简便易行,可在较短时间内较快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比较忠实可靠,是一种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

“寻乌调查”可以说是“开调查会”进行调查研究的一次典型实践和示范。毛泽东在寻乌写的《调查工作》一文,应是受寻乌调查之触动而对长期以来调查研究工作的总结和升华,文中不仅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光辉论断,还发出了“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3]116}的号召。《调查工作》还专门写了“调查的技术”一部分,详细总结了开调查会的七个方面的经验:要“作讨论式的调查”,要提出中心问题并经过辩论的方法,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不能“只随便问一下子”而不经辩论;关于“到些什么人”,要“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并应考虑到不同年龄和职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的问题,要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要根据实际情况;事先“要定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要亲身出

马”;“要深入”,尤其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深入了解一个地方、一个问题的“底里”;强调“要自己做记录”,“假手于人是不可行的”,等等。^{[3]116-118}毛泽东深刻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开调查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红军长期斗争在农村,对城市问题接触较少,但随着红军不断占领城市,城市问题就必须研究,城市的实际情况一定要了解。《寻乌调查》的目的,总起来是想了解土地革命政策在县城的制定和执行问题,而且是“下决心”去了解,并强调“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研究透彻”^{[2]132}。

(二)“寻乌调查”坚定贯彻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思想和方法论原则。同时,群众路线本身也内在地包含着“群众方法”。毛泽东是群众路线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无论在领导、决策、军事斗争还是在调查研究工作中,都可以看到他对群众路线思想原则和工作方法的重视。他始终将群众路线和群众方法作为调查研究的根本指导原则和方法,认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必来自调查研究,来自人民群众,来自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既然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一定是从群众中来,所以共产党员、红军指战员就必须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所需所求,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争取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不了解商业,“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而现实却是,“争取贫民”这件事情,“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2]131}在这里,毛泽东指出了两种情况:一是“一般同志”可能没有意识到争取群众的重要性;二是虽然也有一些领导同志感觉到了群众支持的重要性,但又不知道如何跟群众打交道,找不到落实群众路线的具体方法。所以,长此以往就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难以了解实际情况,当然也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实际上,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就是落实群众路线的好办法,不搞调查研究,难以接触群众;反过来,不走群众路线,不接触群众,不

了解群众,也无法进行真正的调查研究,制定政策策略时也就“非错不可”。关于分配土地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办法好不好要靠实践检验,要看群众是否支持、认可,而只有“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2]229}的办法才是好办法,才是好不好的标准。可见,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特别重视群众路线和群众方法的运用。

(三)“寻乌调查”是运用典型调查工作方法的典范

所谓“典型调查”,就是根据调查研究目的,在初步分析调查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调研对象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便更好地认识同类事物的规律,得出一般性结论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一种非普遍、非全面的调查研究。进行普遍、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当然好,但大多数情况下都缺乏实现的条件,而且需要大量的人、财、物、时间等成本的投入。战争年代尤其如此,根本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全面系统调查的社会环境,更不具备调查研究所需要的大量人、财、物等各种物质条件。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严酷斗争的间隙进行的调查研究,大都具有典型调查的特征。

关于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曾有个形象的说法叫“解剖麻雀”,说的就是典型调查的方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说的正是调查研究对象的典型性。通过对某一类相似对象中的典型进行调查研究,可以得出适用于这一类对象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结论。根据调查研究目的,从宏观或整体调查对象的选择来看,“寻乌调查”具有典型调查的特点。之所以选择寻乌作为调查研究对象,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说得 very 明确:“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多。”^{[2]119}也就是说,寻乌是闽粤赣三省的典型县城,区位优势,对于了解闽粤赣地区其他县城来说具有典型性。这说明毛泽东选择调查研究对象很注意对象的典型性、代表性。对寻乌县城做个“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调查,也就相当于了解了闽粤赣地区的其他县城,能够为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一般参照和遵循,也为红军下一步的发展和行动方向提供参考。典型调查可以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主要表现在对调查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寻乌对于闽粤赣地区而言,具有宏观调查研究的意义。

在微观层面,“寻乌调查”也处处体现着典型调查的方法和特点,如对寻乌城商户的调查、对寻乌地主阶级的调查、对农民阶级各个阶层的分析等。这种抓住典型人物或事件,进行深入分析,体现了典型调查的具体而微之处。“寻乌调查”堪称典型调查的典范。

四、《寻乌调查》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具体细致的实践方案。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研究中国国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若没有调查研究的功夫,而靠异想天开、闭门造车,是找不到正确的办法和出路的;只看到问题的皮毛或细枝末节,就轻而易举下结论、搞决策,则只能将事情弄糟。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实践,是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从问题出发弄清历史和现状,在调查研究中厘清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道路和方法。《寻乌调查》蕴含的调查研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对新时代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改进调查研究思想和工作方法、深入推进调查研究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坚定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方法,学会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解决问题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的思想原则和思想方法。有研究指出,“《寻乌调查》是形成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重要催化剂”,是“一个关键节点”。^[9]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其中有许多重要历史节点,此处暂且不论,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历史进程已清晰地表明正确的思想路线必来自实践,也来自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没有长期实事求是地实践探索,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道路的开创。同样,不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也没有当今改革开放的强国富民之路。实事求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是不可动摇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经常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

是向社会作调查。”^{[10]789}“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0]791}了解实际情况必须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就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会犯主观主义错误,就不能实事求是地制定和执行政策,甚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密不可分,是力行实事求是、达成实事求是的基本路径,也是防止和纠正主观主义错误的有力武器。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实际上将调查研究上升到了哲学高度:调查研究不仅是达成实事求是的路径,而且还是破除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利器,也是坚定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我们非常熟悉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在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同时,他还强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267-268}。因为只有进行“正确的调查”才能了解和掌握“实事”,从而做到“求是”,即发现规律、真理。否则,不仅不能了解客观真实的情况,也难以找到问题症结和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更遑论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将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强化问题意识,学会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仍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基础课和必修课。

(二) 注重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善于通过科学的方式方法提高调查研究工作效率

毛泽东既重视实事求是地做调查研究,又强调坚持科学的调查研究方式方法。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调查研究方式方法,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如要唯物辩证、实事求是、历史地看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需要比较高的思想认知维度。微观层面,解决一个现实问题到底该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如何实事求是地选择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选定了调查研究方法之后如何把控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细节,都需要考量,这就落实到具体的方式和方法层面了。

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时,在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方法论基础上,着重运用了开调查会、进行典型调查等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对调查研究方法和细节的把控,表现出严谨细致、有错必纠的精神。例如,对于如何开好调查会,毛泽东提出了具体细致

的要求。他非常讲究开好调查会的方法和条件,如开调查会要目的明确,要列调查提纲,要亲自做记录等;调查研究过程中还要及时纠偏,如做土地调查时“调查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方法不对”,“调查表内容很复杂”,“调查手续又很麻烦”,所以必须赶紧“变更方法”^{[2]234}。为此他不仅及时调整方法,而且连调查表内容的设计、调查手续的简化等细节也进行了优化,从而使土地调查工作重新回到正轨。这种注重调查研究方式方法的精神,直到现在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当然,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信息技术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科技的进步、物质技术手段的提升等因素,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总体上更为丰富了。在宏观层面,涌现出许多学科间相互渗透的新的调查研究方式;在微观层面,现代科技的各种方法也普遍地被应用到调查研究过程中,数据分析的工具和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分析的精细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总体上具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度。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方式方法如何多样,有一点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就是实事求是和注重方式方法的精神。总之,调查研究必须注重方式方法,善于通过科学的方式方法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效率。

(三) 坚持辩证思维,重视处理好调查研究中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提到空前高度,认为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事物矛盾的精髓。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3]320}。

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工作中尤其重视辩证法,把辩证思维和辩证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在“寻乌调查”之前,毛泽东曾做过很多调查研究,其中不乏对辩证法的出色运用。辩证思维和辩证方法已深刻地融入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成为他调查研究思想和工作方法的精髓。在“寻乌调查”过程中,这种辩证思维和分析方法的运用可谓比

比皆是。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之所以非常成功,成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典范,关键在于他对“事物矛盾的精髓”的洞察、分析和把握。抓住“事物矛盾的精髓”,就是抓住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在把握共性的基础上突出个性,在坚持绝对的基础上不走极端。只有这样,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真正触摸到问题的根源,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实际工作才能有效推进。例如,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各地资源禀赋和乡村的差异性,鼓励进行符合实际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鼓励进行符合实际的实践探索”,“强调必须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1]这些都深刻体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四) 坚持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必须深入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请教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其中,“群众路线”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一条红线、一个标志性特征,已成为做好各项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和方法。将群众路线切实落实在调查研究工作中,是毛泽东“寻乌调查”的鲜明特征,“寻乌调查”就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和方法的一次生动实践。毛泽东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没有虚夸和华而不实的东西,就是扎扎实实地做,认真用行动去落实。例如,他在“寻乌调查”开调查会时特别重视参加调查会群众的广泛代表性,尽量选择各行业各方面的群众,深入倾听群众心声,了解群众所思所盼,调查了解到更深入细致的情况,以求制定出体现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政策策略,然后再用切实的政策执行赢得群众支持。所以,调查研究过程中坚持群众路线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将群众路线的原则和方法渗透在调查研究工作各方面各环节,重视群众路线和群众方法的落实落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

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决策权。对高级干部来说,能不能坚持群众观点?能不能接地气?要做到这一点,坚持调查研究是很重要的方式。”^{[1]54}也就是说,决策是否科学,工作是否有成效,开展调查研究是前提条件,是重要方式,而进行调查研究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接地气”,脱离群众则不可能“接地气”。这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内在联系。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去安吉县调研,他走村入户深入群众,全面了解安吉发展农业、保护生态、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情况,归纳总结了安吉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宝贵经验,提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既体现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也深刻把握了生态环境发展的时代潮流,顺应了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的热切期盼,使浙江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也为后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样板、奠定了基础。

五、结束语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环节和根本途径,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关键历史节点,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经典文本,是一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宝库,其中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意蕴深厚又有历史价值和永恒的借鉴意义。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重温毛泽东的《寻乌调查》,领略其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意蕴,有利于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改善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深入推进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2] 毛泽东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 HANAN P.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Essays by Patrick Hana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121.
- [9]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中的“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J]. 外语研究,2013(6):72-76.
- [10] 朱羲胄. 贞文先生学行记:卷一[M]. 上海:世界书局,1949.
- [11] 王桂妹. “孝”:林纾与“五四”新青年论争的“隐性”焦点[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4-45,191.
- [12]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Jane E Lewin,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 [13] BATCHELOR K. Translation and Paratexts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2018.
- [14] 江中柱, 闵定庆, 李小荣, 等. 林纾集:第6册[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
- [15] 林纾. 畏庐三集[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 [16] 李家骥, 李茂肃, 薛祥生. 林纾诗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322.
- [17] 江中柱, 闵定庆, 李小荣, 等. 林纾集:第2册[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3.
- [18] 江中柱, 闵定庆, 李小荣, 等. 林纾集:第1册[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270.
- [19] 钱谷融, 吴俊. 林琴南书话[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王圆圆)

(上接第424页)

-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杨信礼. 重读《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5] 刘海藩, 万福义. 毛泽东思想综论[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6] 黄伟, 郑德荣. 毛泽东“寻乌调查”与党的思想路线形成论析[J]. 高校理论战线,2012(7):42-46.
- [7] 刘先春, 李金玲. 毛泽东《寻乌调查》的新时代价值[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2):174-182.
- [8] 游海华. 《寻乌调查》的学术价值[J]. 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38(2):66-74.
- [9] 周建华. 《寻乌调查》产生的历史语境和理论意义[J]. 红色文化学刊,2021(3):67-75,111.
-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杨谦, 孔维明. 习近平乡村振兴战略研究[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4(4):83-95.

(责任编辑:王圆圆)